

河套地区战国秦汉塞防研究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要: 阴山河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 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征战、融合的舞台。战国秦汉阶段,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始皇筑万里长城、汉武帝开边, 到东汉南匈奴入塞, 前后近 400 余年的历史过程中, 在河套地区的阴山南北, 留下了众多的长城, 障塞和墓葬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本文分五个部分探讨了战国、秦、汉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军事防御系统, 逐步揭示出河套边塞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河套地区; 战国; 塞防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辽远广袤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带, 地跨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理单元。这一区域, 从东侧的大兴安岭南端向西, 燕山连绵, 阴山横亘, 然后是东北—西南向的贺兰山, 穿过辽阔的阿拉善戈壁, 再向西是阿尔泰山和天山。这条山系基本上处在北纬 41-42 度线上下, 而我国北方的历代长城也基本分布在这条山系的南北, 长城自然也就成了气候变化, 以及农、牧业的分界线。由此, 这一区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也成为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往来征战, 相互融合的一个舞台。特殊的地理环境, 多变的气候条件, 形成了这一区域形态各异的自然经济类型, 也造就了源远流长, 色彩纷呈的灿烂古代民族文化。

在阴山以南黄河大回折之内, 是沟壑纵横的鄂尔多斯高原。该区域河流稀少, 风沙地貌发育, 间或有盐碱湖泊, 是一块干燥的剥蚀高原。北缘的库布齐沙漠为流沙或半固定沙丘, 南缘的毛乌素沙地多呈固定或半固定状态, 沙丘间的洼地有着水草丰美的草原, 由于萨拉乌素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河套人”化石的发现, 这里被认为是历史上较早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之一。这个区域所代表的应当是广义的河套概念。

闻名遐迩的河套平原, 镶嵌在阴山山地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这是一个断陷的冲积平原, 地势平坦, 土层深厚, 黄河及其支流纵横其间, 形成了发达的农业灌溉系统。河套平原地处黄河中上游, 黄土高原的北端, 蒙古高原的南缘, 按地貌和农业生产的习惯, 通常分为前套和后套。以巴颜高勒为界, 以西至石咀山称为后套平原, 以东至呼和浩特称为前套(或土默川)平原。这个区域是狭义的河套概念。

内蒙古的阴山、河套地区,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而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互发生和不断冲击碰撞的地区, 也成为历史上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政权之间的必争之地。特别是战国至秦汉时期, 为了占有阴山、河套这处极具军事意义和经济价值的战略要地, 抵御匈奴的南下侵扰, 中原王朝曾耗费大量人力和物资, 在阴山南北先后三次大规模地修筑长城。这些古代先民们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 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的往来征战和交互融合的历史事实。

一、赵长城与高阙塞

匈奴兴起于大漠南北，有关其名，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晚期阶段，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史籍当中了。在文献中，有关先秦时期匈奴和中原发生关系的记载，较为可靠的有三条：

一是刘向《说苑·君道》所载燕昭王元年（前 312 年），昭王问政于郭隗时，郭隗提到的“匈奴驱驰于楼烦之下”；¹

二是《史记·李牧列传》所载赵孝成王初年（前 265 年），“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²

三是《战国策·燕策三》所载燕王喜二十七年（前 228 年），秦将军樊于期（音乌基）得罪，逃亡至燕，燕太子丹把他收容，太傅鞠武谏曰：“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³

由此可知，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匈奴的骑兵已经常常出没于当时的楼烦（今晋北）一带。当时的秦、赵、燕三国都在北界修长城以防匈奴，故有“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⁴的记载。

河套及南流黄河以东地区，自春秋以来，本是林胡、楼烦共有的游牧之地。秦穆公时（前 659～前 621 年），“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⁵ 赵武灵王（前 325～前 299 年）二十年（前 306 年），也曾“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⁶

进入战国中、晚期之交，赵武灵王再次北征林胡、楼烦，将赵国的势力拓展到了阴山西段的大青山、乌拉山和狼山的山前地带。《史记·匈奴列传》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⁷ 赵武灵王所筑长城，起自“代”，即今河北省蔚县境内，沿洋河进入内蒙古兴和县，经卓资县抵阴山脚下，沿阴山南麓向西延伸，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包头市郊区、乌拉特前旗白彦花乡的乌拉山南麓，至乌拉特后旗狼山南麓的达巴图沟（当地亦称大坝沟）口西侧为止。

很长时间以来，有关赵武灵王所筑之高阙的位置，史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近年来，我同巴彦淖尔市文物站的专业人员，多次沿阴山南麓的赵长城向西追踪调查，在乌拉特后旗狼山南麓的达巴图沟口西侧，发现了赵长城最西端的长城遗迹及高阙塞的遗址。调查发现，赵长城在巴彦淖尔境内由东向西，蜿蜒在阴山西段的狼山南麓，在达巴图沟口两侧仍留有长城的遗迹。

高阙塞，位于乌拉特后旗那仁宝力格苏木那仁乌布尔嘎查北侧的山脚下，古城夹在东侧的达巴图沟和西侧的查干沟的台地断崖之上，古城与达巴图沟河床高差近 20 米。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 度 36 分，北纬 40 度 53 分，海拔 1130 米，东北距巴音宝力格镇约 45 公里。

地表现存古城由南北两个小城组成。北城略成方形，边长 36 米左右。墙底宽 5.8 米，顶宽 3.8 米，高 4～6 米不等。墙体系用较大的河卵石垒砌而成，墙体内部填充小石块和砂子等。城内东北角临沟处建有登城的台阶状踏道，踏道长约 25 米，宽约 2 米，台阶宽度近 1.8 米。北城在南墙中部辟门，门址宽约 2 米余，不见瓮城与角台。城内四周贴墙处，发现较大的房址 6 座。南城为长方形，其北墙共享北城的南墙并向东西延筑，东西长约 58 米，南北宽约 43 米。城墙较窄，墙体宽约 1.8 米，存高约 2 米，门址在南墙中部偏东位置，宽 2.3 米。城内正对门址及四周有石砌房址遗迹，以前的调查中曾发现过汉代的铁釜、铁甲片和箭头等遗物。两个小城的修建风格明显不同，反映其并非同一时代修筑。

在该处城址北墙及西墙外的缓坡之上，有一段东北～西南向的石墙环绕，虽遭损毁却依然清晰可见。墙体系用不规则石片垒砌，中部填以砂石，长 322 米，宽度 1.1～1.35 米不等，残高 0.2～1.5 米。此墙东北端延伸至达巴图沟西侧沟沿，与沟对岸山坡上的石墙遥遥相对；向西南延伸与石城西面查干沟东侧的一个小山包相连，山包顶部有一石砌的建筑，观察应是一座坍塌的烽火台遗址。烽火台大致呈方形，东西长 5.2 米，南北宽 5.5 米，残高约 1.5 米，坍塌的石块分布范围较大，附近发现有少量灰陶片，其它不存。此烽火台向西南，越过查干沟西侧，再没有发现石墙的遗迹。古城和烽火台的西面，扼查干沟两侧，有两座对称高耸的暗红色山峰，十分高大，形似双阙，高阙塞可能据此得名。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高阙：“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⁸又史载，“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高阙也。”⁹临戎城遗址在今磴口县补隆淖乡西南，即河拐子古城。以此地山势及与临戎古城相对地理位置推测，该古城北侧的方形小城，既无瓮城又无角台，与汉代构筑的边塞城防建制明显不同。因此，该小城及城外的石墙，即应是战国晚期赵武灵王所筑之高阙塞及塞墙。而南侧较大的石城，当是在汉代沿用旧城重新扩筑，然作为戍卒较少的边塞之地，其防御的重点仍然应在较为高大坚固的北城。高阙塞的东侧是宽阔的达巴图沟口，西侧是查干沟口，城址位于两沟的交汇之处，控制着北方草原通向河套的交通咽喉，易守难攻，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确为绝佳的军事要塞。

二、秦长城

正当中原进行着秦的统一战争而无暇北顾之时，匈奴再次南下占据了河套地区。此前，自赵武灵王北筑长城，从河套地区驱逐林胡、楼烦后，林胡在文献中就突然消声匿迹了。

1961～1964 年，蒙古和匈牙利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的呼尼河谷北岸发现了一批匈奴墓，这些墓葬和呼尼河谷其它匈奴墓不一样，形制为竖穴土坑墓，不见葬具，随葬品有陶罐、马衔、马镡、箭头、弓弭、漆器等，年代在公元前 3 世纪～公元前 1 世纪。这类墓葬的形制，与发现于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相同，据此有学者推测，呼尼河谷北岸墓葬的墓主人，可能是来自河套地区的游牧部族的后裔。从赵武灵王北征的路线看，林胡在楼烦的西北，那么分布在黄河南北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竖穴土坑墓，就有可能是林胡的遗迹。

匈奴形成后，在其四大异姓部族中有兰氏部落。据此可以推测，自赵武灵王北筑长城后，林胡可能越过阴山，北上游牧到了漠北的鄂尔浑河流域，并加入了匈奴的军事大联盟，成了匈奴四大异姓部落之一的兰氏部落。林胡之“林”与匈奴异姓贵族兰氏之“兰”的读音非常相近，恐非偶然。也许是林胡投奔匈奴之后，在文献中就此改头换面，皆以匈奴身份出现了。此后到秦汉之际，出现在史籍中的就只剩下“楼烦白羊王”之属。这很可能是，居于林胡之东的楼烦在林胡北遁之后，于秦汉之际逐渐入居了原林胡占有的河套地区。对此，吉林大学的林沅教授亦明确指出，“公元前三世纪末到前 127 年这段时间内河套内部的遗存，非‘楼烦白羊王’之部族莫属。”¹⁰这无疑是十分有见地的。其后，这支‘楼烦白羊王’很可能也成為了匈奴的别部。

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秦灭六国，建立秦王朝。秦统一后，匈奴与中原的接触较以前更为频繁。“（秦始皇）三十年（前 217 年），使蒙恬将十万众，北击胡，渡河取高阙，据阳山、北假中”¹¹。这里的“阳山、北假”，即是指现今的狼山及河套地区。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由于头曼单于不断南下侵扰，秦乃使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匈奴，匈奴败撤，秦军夺取河南地。匈奴被迫北却七百余里，从阴山以南退居阴山以北的漠北草原地带，阴山

之南的河套地区尽纳入秦的版图。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¹²。为了巩固北部边防，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秦又把原秦、赵、燕三国在北方的长城连接起来，重新修缮，并东西扩展，筑成万里长城。秦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向北至河套，在阴山中跨山越岭，向东至山海关，延袤五千余里，并使蒙恬拥兵上郡（秦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以为守卫。

秦朝所筑之长城，在历代长城中是最为科学的。秦长城多半修筑在阴山和燕山山峦北坡，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山谷隘口及平川地带多用夯土筑成，山地则多用石砌或土石混筑，西段多在原赵长城以北，东段又多在燕长城之南，东西横亘约 3000 公里。在河套地区境内，这段长城多以石块垒砌，蜿蜒于巴彦淖尔市和包头市北部的阴山山脉之狼山和什尔腾山北坡，保存基本完好。如乌拉特前旗小畜太之秦长城，跨山越沟，气势磅礴，构筑十分坚固。秦所筑之长城，底宽 4~5 米，存高 3~8 米不等，在山谷间还修有水门，在山峰之上间或筑有高大的烽火台。这段长城向东经武川县南折入呼和浩特北部，再向东进入卓资县，经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兴和县东去。

秦朝在北边新开拓的领土上，分别设置云中郡（原赵国云中城，今托克托县古城村）、九原郡（原赵国九原城，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三顶账房古城）、上郡（约在今鄂尔多斯市南部）、雁门郡（约在今乌兰察布市南部）等郡县，迁徙内地居民屯垦戍边，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三、塞外列城与塞

前 206 年，西汉王朝建立。当时，匈奴乘秦末农民起义的混乱时机，重新夺回了此前秦占领的阴山及其以南地区，并渡过黄河，占据了鄂尔多斯高原大部。在冒顿单于（前 209~前 174 年）时期，匈奴征服了许多邻族，先后东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丁零各族。后又消灭楼兰、乌孙、乌揭及其周邻各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建立了一个以漠北为中心的庞大奴隶制政权。匈奴单于南庭设在头曼城，考其政治军事中心，约在今河套境内的狼山一带。单于庭直接管领的中部，即是位于代郡、云中和朔方郡以北的今大青山、狼山以北地区。

西汉初年，匈奴成为汉王朝最大的威胁，曾屡次南下寇边。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的侵扰，高祖七年（前 200 年），刘邦亲率 30 万大军迎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被匈奴围困达七日之久，后用陈平“密计”以重金贿赂匈奴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解脱。“白登之围”后，刘邦便采用娄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前 133 年）始，汉朝开始对匈奴进行反击。汉武帝派马邑人聂壹，诱匈奴单于取马邑，又命李广、韩安国等率兵三十余万埋伏于城外，俟机出击，但被匈奴识破，引兵而去。此后，经元朔二年（前 127 年）的河南之战，“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¹³卫青击败了乘楚汉相争重新盘踞河南地的楼烦、白羊王，夺取河南地，汉在此立朔方和五原二郡，并移民屯边，穿渠引水，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建设。又经元朔五年（前 124 年）至六年的漠南之战；元狩二年（前 121 年）的河西之战；元狩四年（前 119 年）的漠北之战，汉武帝大败匈奴，迫使匈奴退至漠北草原。¹⁴

汉王朝自北击匈奴起，便在阴山、燕山南麓兴筑长城，作为防御匈奴南下的屏障。考古调查发现，在今河套地区可见汉代增筑的长城共有三条。其中最南的一条位于乌拉山南麓，东起自包头市昆都仑沟口附近，向西至乌拉特前旗西山嘴卧羊台；另外两条则位于阴山以北的戈壁荒漠地带。史载，太初三年（前 102 年），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庐朐（河名，在今蒙古国境内），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¹⁵在阴山以北的考古调查

发现，徐自为所筑之塞外列城有南北两条，亦称汉外长城。两条长城东西延伸，南北并行，相距 3~40 公里不等。两条长城均东起今武川县境内，向西经固阳县、达茂联合旗和乌拉特中旗，在乌拉特后旗境内折向西北。其中南线长城终止于乌力吉苏木的沙日扎嘎，总长约近 400 公里；北线长城则穿越蒙古国境内，再折向西南，与今额济纳旗境内强弩都尉路博德所筑之居延塞，即汉代烽燧线相接。

在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正西约 12 公里处，是汉外长城的南线长城。该段长城基本上均是夯土筑成，因水土流失严重，现存高度一般很低，高多在 1 米左右，底宽约 4~6 米。此段长城向西进入乌拉特后旗境内，在宝音图苏木南约 4 公里的长城南侧约 70 米处，有一夯筑的烽火台。烽火台近方形覆斗状，底边宽近 6 米，残高 4 米左右。烽火台为就地取土，逐层夯筑而成，夯层厚 10~12 厘米。夯层中夹杂大小不一的石子，至今夯土墙体依然非常坚硬，然整体保存较差。

南线长城向西进入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西尼乌素嘎查，其西端东南距乌力吉苏木约 60 公里，北距中蒙边境线约 30 公里。

这段长城是外长城中保存较好的一段。墙体以戈壁滩上裸露的片岩就地取材，两侧用石片堆砌，中部填砂土碎石，叠砌而成。墙体底宽 3.4~3.5 米，顶宽约是底宽的一半，高约 2.2~2.3 米。以一汉尺约等于 23 厘米计算，底宽和高度恰巧是汉尺的一丈五和一丈。经二千年风雨的冲蚀，砂土流失，两侧石砌墙体明显向中部倾斜。

各段墙体之间，有着较大的质量优劣之差，有的墙体明显的较窄并砌筑不规则。

南线长城内侧筑有烽火台。在查干呼苏长城墙体南侧 60 米处有一烽火台，周边以石片垒砌，中部填砂，方形覆斗状，中部有一南北向的裂缝。烽火台边长约 7 米，残高约 3.5 米。烽火台和一处房址连在一起，房址的北墙借用烽火台的南面墙体。房址南北宽约 6 米，东西长约 7 米，墙体厚 1.5~2 米左右，其中南墙最厚，约 2 米。东墙北侧与烽火台相连处辟门，门宽约 1.2 米。烽火台和房址的墙体砌筑方法相同，均是两侧用石片垒砌，中间填砂土石块等。房子内侧的转角处略呈圆弧形，北墙里侧还残留有嵌在墙体里的木桩痕迹。房址内发现有少量汉代灰陶片。西尼乌素烽火台底宽约 5.5~5.7 米，台南侧有见方 9 米的房屋基址；朝伦圜圉烽火台边长 6.5 米，残高 3.2 米，在石砌边框内侧的夯土中，分层铺有红柳条等植物以为加固。

此段长城呈西北~东南走向，烽火台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 度 02 分，北纬 41 度 42 分，海拔 1078 米。

乌拉特后旗境内靠近中蒙边境线巴音努如的呼伦陶勒盖北线长城，其构筑方式和保存状况与南线长城基本相似。长城亦呈西北~东南走向，墙体以戈壁滩上裸露的片岩就地取材，用片石交错叠砌而成。墙体底宽顶窄，墙面垒砌略齐整，中部填以土石，因水土流失，墙体中部往往形成槽状。北线长城形体规模明显小于南线长城，墙体底宽一般在 2.3~2.4 米，顶宽约 2 米，高约 1.1~1.2 米，底宽和高度恰好分别是汉尺的一丈和五尺。这段长城在沟壑、山谷处，均是在墙体的底部，用平整的石块砌出水道，其上架以长条形石板作过梁，形成排水的水门。水门一般宽近 0.5 米，高约 0.25 米。此外，在长城两侧略高处，发现有多处石材的采石场。

汉元帝时颇习边事的郎中令侯应曾言道“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饒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徙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¹⁶

就目前考古调查的发现，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位于阴山以北的这两条汉外长城及所附之亭障，即是汉代文献所载汉武帝时命徐自为所筑之“塞外列城”。但就现场观测，这两条长

城构筑的规模，都不足以作为一道屏障阻挡匈奴的骑兵。特别是北线长城的高度和宽度，都似乎不象是一个完工的军事建筑，倒象是在一个统一的尺度要求下完成的“第一期工程”，而实际上却没有再做后续的建筑。《前汉纪》载侯应对汉元帝道：“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苑囿也。至孝武，出师征伐，斥夺其地，攘之于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而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砂，匈奴来寇抄，无所藏隐。从塞以南，径深山大谷，往来差难。边境长老言，匈奴失阴山，后过之，无不哭”。¹⁷

因此可以推断：汉武帝以来，原本期望在秦始皇长城以北修筑“塞外列城”，将匈奴阻隔于阴山以北的戈壁之上。但是，此地乃无草缺水的荒凉之地，又皆筑长城之材料匮乏，再加此地远离粮食产区，粮米供应自然十分困难。故而仅仅就地取材，修筑了两条低矮的墙体，基本上没有起到真正军事防御的作用。因此，这两条长城应当是没有完工即已放弃的军事工程。在阴山北坡秦长城的内侧，考古调查曾经发现了汉代的烽火台和居住址，以及汉代的铁甲片和箭头。说明汉代最终还是把对匈奴的防线后撤，放在了更为理想的秦长城一线。

战国、秦汉时期，往往将长城统称为塞或障塞，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兴筑的赵北长城，称“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¹⁸；秦始皇派遣蒙恬北逐匈奴“因河为塞”¹⁹；汉武帝派遣苏建“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²⁰等等，都是指长城，也称做塞墙。在长城沿线的山谷口或平川地带每隔数十里兴筑的小城，称为障，由候官驻守，故又称为候城；在山中兴筑的瞭望和防守据点，叫做亭；在重要山谷口和交通要道上兴筑的防守据点叫做塞，有时也称为关。在长城沿线及各城障之间，筑有一系列的互相可以瞭见的烽火台，统称为烽燧或燧。实际上，各城、障、塞、关、亭、燧都有自己的固定名称，如遮虏障、望亭、鸡鹿塞、化胡燧等等。有固定专有名称的塞，仅是长城沿线一处独立的军事防御设施，有时容易与总称长城为塞的塞相混淆，造成误解。

四、光禄塞和鸡鹿塞

光禄塞，本来的含义应当是指汉外长城，即是由汉光禄勋徐自为所筑之塞外列城，故称光禄塞。《汉书·地理志》五原郡固阳县下注有：“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呼河城，又西得宿虏城”²¹。此处所言之光禄城，应是指光禄勋徐自为驻守的城障，而不是通称长城的光禄塞，其余四座城名，应是光禄塞上不同城障的名称。

增隆昌古城，位于乌拉特前旗小畜太乡政府以东约 15 公里处，北距马鬃山秦汉长城直线距离约 2 公里。古城的南面和西面为白山水库环绕，水面最近处离城墙仅 5 米左右。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 度 34 分，北纬 41 度 10 分。

古城基本呈方形，每边长约 400 米。保存较好。城墙底宽约 4 米，顶宽 1.5 米左右，最高处约 4 米。城墙夯筑，夯层厚 10~15 厘米，夯层均匀，包含物单纯，黄色土夹杂小石子。古城仅北墙正中偏西处有一马面，其余墙体没有马面。东墙辟一城门。城址中部有一东西向水渠穿过，从水渠切破西墙剖面可以看到，墙体直接夯筑在砂石上，不见下挖沟槽的痕迹。东墙因靠近山体，地势较高，墙体亦直接夯在砂石上。城址中部发现有汉代的泥质绳纹灰陶片、布纹瓦残片等遗物。因其地理位置，对照文献记载，推测这座古城很可能就是汉代光禄城故址。光禄塞在西汉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防御作用，曾有效遏止了匈奴的南侵。

朝伦图古城，位于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西尼乌素嘎查宝力格小组南线长城以南约 0.5 公里处。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 度 59 分，北纬 40 度 44 分，海拔 1026 米。

古城东面是季节性的高勒布桑旦赛拉河，河水绕城北向西北流去。内蒙古考古工作者曾于 1976 年发掘了该座古城。城墙用大石块垒砌，构筑坚固，平面呈方形，城墙每边长约 127 米。南墙西段保存完好，基宽 5.5 米，顶宽 2.6 米，残高 2.7 米。城墙四角有向外突出的方形角台，角台边长 4.8 米。东墙中部开设城门，城门宽 4.5 米。城门外加筑有方形瓮城，瓮城东西长约 8.5 米，南北宽约 9.5 米。城门两侧、城内四角及西、南两墙正中的内侧，都垒砌有蹬城踏道，各宽约 1 米。城内西南部筑有独立院落，并在东、北两墙正中开设门址。院内有用石块垒砌的房屋基址十余座，其中以西南角上的一座房基规模较大。城内西北部分布有房屋基址十多座，东北部和东南部仅有少数的房屋基址。房屋形制为石砌的方形和圆形。城内全部被流沙覆盖，经清理后发现遗物较多，有大量的汉代的布纹板瓦和筒瓦残片，其中有“千秋万岁”文字瓦当。出土有铜镞、铜弩机、铁斧、铁镢、铁镰、铁剑、铁甲片和粗绳纹灰陶片等等，同时出土有大量的糜子壳及马、牛、羊骨。

这座古城地处光禄塞南线长城的最西端，构筑坚固，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或许可能就是汉宿虏城遗址，但目前尚需作进一步的工作来确定。

光禄塞建成后，曾在军事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保卫了汉朝北部边郡的安宁。宣帝甘露三年（前 51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就是过外城进入朔方郡，再经西河、上郡而至长安城，觐见了汉宣帝。呼韩邪自长安返回漠北时，曾自愿请求留居漠南的光禄塞上，以共同保卫汉朝北部边境地带的安宁。元帝竟宁元年（前 33 年），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和亲，后宫良家女王嫱（昭君）自愿请求嫁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封其为“宁胡阏氏”。从此以后，汉朝的北部边境局势更加稳定，汉朝削减守卫外城的大半兵卒，节省了大量军事开支。长城内外形成了社会生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文化交流不绝，农牧业生产得到发展的大好局面。这种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升平景象，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

鸡鹿塞，位于磴口县狼山西段的哈隆格乃沟口外西侧的阶地上，东北距达巴图沟口的高阙塞约 15 公里，东南距朔方郡西部都尉治所窳浑县城故址约 25 公里。朔方郡是汉代的北方边郡之一，鸡鹿塞是朔方郡在阴山西部长城沿线的一处重要军事据点，又曾是汉与匈奴和平交往的出入关塞。

朔方郡的北部为阴山山脉，穿越阴山后即可进入广袤的蒙古高原。西汉时期，匈奴单于北庭设在朔方郡西北方漠北的鄂尔浑河流域。汉王朝派兵越过阴山北击匈奴时，经常经由定襄、云中、五原、朔方等几条路线进军。而经由朔方郡出击时，穿越阴山的主要通道就是鸡鹿塞。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 度 30 分，北纬 40 度 46 分，海拔 1145 米。

鸡鹿塞城址高出谷底约 10 米。古城全部以石块垒砌，城墙外侧垒砌大石块，外表平直整齐，中间填充较小的石块和砂土。城址平面呈正方形，正南北向，每边长约 69 米，南面城墙偏西处开设城门，宽约 3 米，并加筑有方形瓮城。瓮城南北长 8.6 米，东西宽 8.2 米。城墙的四角还筑有向外突出的方形角台，边长 7.7 米。在南墙东半部内壁砌有斜坡形踏道。城墙基部厚约 5.3 米，顶部厚约 3 米，一般残高 7 米左右，最高处为 8 米，高大坚固，至今基本保存完好。城内南部及东部墙下，筑有宽约 5 米，高约 40 厘米的石砌台基，其上构筑有方形房址。南墙里见有木柱痕迹。城内散布有少量的汉代粗绳纹灰陶片及残瓦。

城址南面和北面各被一条小沟截断。城址北墙及西墙外有一道东北～西南向的石砌墙体，由城址南端沟沿经城址西侧至城址北侧沟沿，长约 300 余米，这段墙体，宽 1.2～1.5 米，残高 0.5 米；由城址北侧沟沿至哈隆格乃河谷的石墙长约 120 米，在河谷对面沿狼山向东北延伸。这段墙体均为石片垒砌，中部填以砂石，宽 2～2.5 米，保存不甚完整。从现场情况判断，很可能是塞墙遗迹。

从哈隆格乃山口向北通行约 20 公里，即与东北面的达巴图沟山谷相合，再向北行，即

可穿越阴山，进入高原地带。因此，鸡鹿塞是扼守从漠北通往河套地区主要通道上的重要关隘。

宣帝五凤四年（前 54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王朝，汉与匈奴间的战争状态从此宣告结束。基于呼韩邪单于自己的要求，愿留居漠南光禄塞。其时呼韩邪单于曾途经鸡鹿塞，从此鸡鹿塞载于史册。直至西汉末年的数十年间，北方边郡都是在和平环境中度过的。西汉以后，匈奴再次崛起于蒙古高原。东汉和帝永平二年（90 年），汉将军窦宪与匈奴南单于联合出击，经由鸡鹿塞出漠北，大败匈奴北单于，显示了鸡鹿塞亦是作为从阴山以南进入蒙古高原的一条快捷通道的重要作用。

五、朔方郡三古城

朔方郡设置于西汉武帝时期。元朔二年（前 127 年）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出击匈奴，自云中出兵，西经高阙，再向西直到符离（今甘肃北部），收复了河套以南原秦王朝的辖地（通称“新秦中”），并在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带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因朔方郡正位于汉朝国都长安的正北方，对汉朝和匈奴都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汉朝因此取《诗经》中“城彼朔方”之意，将该地命名为朔方郡，管领有三封、窳浑、临戎、朔方、修都、临河、呼遒、渠搜、沃野、广牧等 10 县。

朔方郡辖地位于黄河河套的西北部，即黄河河道分出南、北两河及河道东折为中心的部位。就目前对于这一地区汉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和对汉墓进行的发掘情况分析来看，半数以上的城址地点能够基本确认。其中陶升井（三封）、保尔浩特（窳浑）、河拐子（临戎）三座古城，位于现今黄河东折处西边的磴口县境内，呈品字形分布，彼此相距近 30 公里，是目前这一区域所作研究较多的古城遗址。

陶升井古城，位于磴口县哈腾套海苏木包尔陶勒盖汉代墓群西侧，在三座古城的西南端，大部分已被流沙覆盖。在东西长约 740 米、南北宽约 560 米的范围内，地表上散布有许多砖、瓦和陶片，仔细观察可分辨出有大小两城相套的城垣。外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现今只能找到北面和西面残墙痕迹，各残长约 130 余米。子城位于外城的西北隅，长宽各约 118 米，南墙留有开设城门的豁口。这类筑有子城的城垣，是西汉初年在北边郡县出现的新的城市形制。

《水经注》“河水”条，注：“河水东北径三封县故城东，汉武帝元狩三年（前 120 年）置。”²²《元和郡县志》“丰州”条：“三封，在今丰州西二百里”。“夏州长泽”条：“今县北二十里，三封故城是也。”²³由上述文献记载及附近调查等情况看，此城作为汉代三封县故城的推断是可信的。古城至今仍见有水井遗迹和建筑构件及生活器皿残片。从陶升井古城的规模分析，很可能是最早作为朔方郡治的三封城所在地，建筑子城作为郡守的衙署，也应是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所致。

河拐子古城，位于磴口县补隆淖乡河壕村西南 0.5 公里处，三座古城中居于最东端。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 124 年）。该城呈长方形，城垣由黄土夯筑。南北长约 630 米，东西宽约 450 米，古城的西北角及东北角还残留着 0.5~2 米高的夯筑城墙。《水经注》“河水”条：“又北过朔方临戎县西”。²⁴可见，到北魏时黄河仍然是由古城西侧北流的。现今考古调查发现，在河拐子古城西侧，留存有宽约 1 公里多的黄河故道沉积。汉代黄河在从临戎县城西往北折向东流时，分为南北两支。北河是当时的主流，大致为今乌加河河道，南河即现在的黄河。现今南河已经成为黄河主流，且河道已逐渐东移至古城以东约 3.5 公里处。临戎县城以西的广阔地带，因黄河洪泛溢出，积成一个大湖，名屠申泽，又名窳浑泽。

保尔浩特古城，位于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西南约 3 公里处，在屠申泽的西面，居于三座古城最北端。建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 年）。该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 250 米，

南北长约 200 米，城墙厚 9~13 米，南墙中部有一缺口，宽约 20 米，应为城门遗址。古城西北部被沙漠覆盖，保留的部分东墙和南墙，残高 1~2.5 米。据考古发掘及前人研究，该古城即是汉武帝时期所置麻浑县城无疑。

上述三座古城周围，留存有大量的汉代墓葬，上世纪 90 年代初曾进行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²⁵从出土的遗物分析，以补隆淖汉墓出土陶器与其它三处汉墓差异最大。表现在：补隆淖汉墓陶器以罐类为多，壶类较少，未见鸭壶、扁壶，而其它三处汉墓均以壶类为主，罐类居次，鸭壶、扁壶普遍流行。补隆淖汉墓出土遗物从文化面貌上看，反倒和黄河以东鄂尔多斯高原的杭锦旗乌兰陶勒盖汉墓所出遗物相似。²⁶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流经临戎城西侧的黄河主流阻隔了临戎城与三封、麻浑城之间的交往，反而和流量较小的南河之南岸的居民交往较密切的缘故。

磴口县境内的汉代墓葬中，以麻浑古城所在的沙金套海汉墓群延续的年代最长，可从西汉武帝之后直到东汉明帝时期。汉王朝在朔方郡下先后设有的 10 县中，麻浑县位居最西北隅。这里沃野千里，又为国之门户。为抵御匈奴内扰、安定边塞动荡局面，西汉王朝屡遣吏卒以充之。《汉书·晁错传》载：“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为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发而耕，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²⁷又《史记·平准书》记元鼎年间（前 116~前 111 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²⁸。

在这种情况下，现今乌兰布和沙漠东北部开始了大规模的农田屯垦。自此之后，战乱渐得以平息，河套地区的经济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宣帝即位以后，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汉朝从此“罢关檄之徼，息兵民之劳……朔方无复兵马之踪六十余年矣”²⁹。这六十余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河套地区人口的繁盛和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因此，西汉王朝最后半个多世纪，是北边诸郡开辟以来人口最多、农业最发达的时期。汉宣帝甘露三年（前 51 年），汉王朝遣呼韩邪单于归国，“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³⁰这约合今二百余万斤的“边谷”自应是边地所产。在墓葬上，此时墓葬数量多，形制整齐划一，用材讲究，且均系夫妻合葬，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稳定性，同时成套的随葬品和大量出土装有谷粟的仓储器，如圆仓、方仓、樽、鸭壶等，特别是有持戟卫士把守仓门的长方形粮仓，则充分表现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

新莽以后，朔方郡开始进入衰退期。东汉时期，朔方郡治迁到了临戎县，并撤销了麻浑县，境内农业人口大减。公元二世纪中叶，南匈奴再次进入河套，朔方郡治被迫从临戎迁到了五原郡。从此，朔方郡及所属县城全部沦为废墟。朔方郡及其鸡鹿塞，从设置到废弃，共经历了约 260 余年的时光。

战国秦汉以来，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始皇筑万里长城、汉武帝开边，到东汉南匈奴入塞，前后近 400 余年的历史过程中，在河套地区的阴山南北，留下了众多的长城，障塞和墓葬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深入挖掘这些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这一地区战国秦汉时期政治经略、军事防御和民族融合的各个侧面，探讨具有独特历史传统的河套边塞文化逐步形成的历史进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图一 乌拉特后旗高阙塞后查干沟及双阙



图二 乌拉特后旗达巴图沟和查干沟口的高阙塞



图三 乌拉特后旗高阙塞及高阙、赵长城远眺



图四 乌拉特后旗高阙塞北城东北角踏道



图五 乌拉特前旗小余太秦漢長城



图六 乌拉特前旗小余太秦汉长城



图七 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土筑南线汉外长城



图八 乌拉特后旗宝音图苏木南线汉外长城土筑烽火台



图九 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西尼乌素石砌南线汉外长城



图一〇 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朝伦圈圖南线汉外长城石砌烽火台



图一一 乌拉特后旗巴音努如石砌北线汉外长城



图一三 乌拉特后旗巴音努如北线汉外长城采石场



图一二 乌拉特后旗巴音努如石砌北线汉外长城水门



图一四 乌拉特前旗小余太乡增隆昌古城西墙土筑墙体



图一五 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朝伦圪圖古城遗址（东北——西南）



图一六 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朝伦圪圖古城南墙外侧



图一七 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朝伦圪圖古城内石砌方形房址



图一八 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朝伦圪圖古城内石砌圆形房址



图一九 磴口县鸡鹿塞、塞墙及哈隆格乃沟俯瞰（西北—东南）



图二〇 磴口县鸡鹿塞南墙城门及瓮城（北——南）



图二一 磴口县汉朔方郡三封古城外夫妻合葬墓



图二二 磴口县汉墓出土黿形陶倉

参考文献

-
- ¹史记·乐毅列传[M]. 刘向. 正义说苑·君道[M] 卷一。
- ²史记·李牧列传[M]。
- ³战国策·燕策[M]。
- ⁴史记·匈奴列传[M]。
- ⁵史记·匈奴列传[M]。
- ⁶史记·赵世家[M]。
- ⁷史记·匈奴列传[M]。
- ⁸酈道元. 水经注[M]。
- ⁹汉书·地理志[M]。
- ¹⁰林沅. 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3 (1-2): 139。
- ¹¹史记·秦始皇本纪[M]。
- ¹²贾宜. 新书·过秦论[M]。
- ¹³史记·匈奴列传[M]。
- ¹⁴汉书·武帝纪[M]。
- ¹⁵汉书·武帝纪[M]。
- ¹⁶汉书·匈奴传[M]。
- ¹⁷前汉纪·前汉孝元皇帝纪卷第二十三[M]。
- ¹⁸史记·匈奴列传[M]。
- ¹⁹史记·匈奴列传[M]。
- ²⁰史记·匈奴列传[M]。
- ²¹汉书·地理志[M]。
- ²²水经注·河水[M]。
- ²³元和郡县志·丰州[M]。
- ²⁴水经注·河水[M]。
- ²⁵魏坚. 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 ²⁶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杭锦旗乌兰陶勒盖汉墓发掘报告[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1 (1)。
- ²⁷汉书·晁错传[M]。
- ²⁸史记·平准书[M]。
- ²⁹后汉书·南匈奴传[M]。
- ³⁰汉书·匈奴传[M]。

Research on the Frontier Defense System of Hetao Area

Wei Jian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Yinshan-Hetao area is always the stage of the warfar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northern nomad people and the agricultural people from the Central Plain. During the historical stage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Qin and Han Dynasty, Lord Wuling of the Zhao State 'study the wear, the horse-riding, and the arrow-shooting from the northern nomad people', Qin Empire built the Great Wall, Lord Wu of Han Dynasty developed the borderland, and the Southern Xiong Nu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joined into

the frontier. During the above near four hundred's historical process, lots of remains including the Great Wall, old castles, and tombs were remained around the Yinshan region of the Hetao area.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o discuss the frontier defense system about the three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s, to gradually reveal the historical procedur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Hetao frontier culture.

Keywords: Hetao Area; the Warring States; Frontier Defense

收稿日期: 2007-08-30

作者简介: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